

《新论语》译成英文的时候,“仁”该如何翻译一直颇费思量。

在过去的译作中,常见的是将“仁”译为“benevolence”(仁慈)。“Benevolence”虽含“仁爱”,但多少有自上而下的“恩施”之意,与孔子之“仁”未必相同;另一个选择是“humanity”(人性)一词,其中有善待他人的人道之义,与孔子的“仁”相近,也与孟子“仁者,人也”的释意相同,但“humanity”更多是指人性的发扬,着重点在于人的本性,与“仁”的指向实有差异。其它可选用的词汇还有Compassion(同情)、affection(慈爱)等,虽或多或少都有“仁爱”之义,然而,总欠妥帖,难言全面。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如果这一概念把握不准,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也必有偏差,更遑论《论语》的翻译。

孔子对“仁”曾做过简洁而明确的概括:“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22)。“仁”字由

“仁”该如何翻译?

钱宁

“人”和“二”组成,《说文解字》释“仁”:“从人从二”。可见,仁的实质,在于人与他人之间关系。

历史上,每个思想家都有自己思索和试图回答的中心问题。对孔子而言,人与他人之间应该具有何种关系,是其一生探究的中心问题。可供对照的是,柏拉图的政治学说始于一个“理想国”应该如何建构,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则是更多基于对“如何才是幸福的人生”的思索。

对“人与他人之间应该具有何种关系”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仁”,也就是“爱人”。仁是孔子思想的逻辑起点,一部《论语》,就是围绕着“仁”而展开论述的。当然,仁之爱人,可以有多种形态,但

是,无论人与他人之间具体关系如何变化,其不变的原则是“爱人”。“爱人”之“爱”,高标准是“忠”,底线是“恕”,仁的本质尽在其中。

在英文词语中,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现成词汇,能全面译出“仁”的准确含义和深刻内涵。反复思考之后,觉得英译不如音译,将“仁”直接译为“Ren”,也许更有意义。商议之时,《新论语》一书译者 Tony Blishen 先生也

提出译文中可以将“仁”音译为“Ren”,认为这虽然不是一个西方读者熟悉的英文单词,但相信读者会随着阅读的延伸而形成自己对这一词汇的独特理解。伟大的思想家一定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创见,其独特的思想



纯粹从形状上说,海嘴与海湾是极为相像的,这就如同说足球与地球是极为相像的一样。相异的仅仅是,海湾的弧度和弯曲,在地图册或是地球仪上才比较清晰;而海嘴的弧度和弯曲全凭我们的肉眼去感觉,去把握,就像同为球体形状的足球我们可以踢,可以用脚去把握它一样。

若用渔民们的话说,海嘴就是海岸的豁口,有弧度,弯曲如嘴,既然它生长在海边,那自然就是大海的嘴唇了。也正因为有弧度,大海嘴里含着的水,水势总要平缓些,大些的海嘴也就成为了渔港,所以海之嘴常常含着的,也就是那些密密麻麻的舢板和橈桅了。

见过南海的海嘴。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在陵水。见着的时候正是入夜时分。晚潮正急,涌浪一层又一层涌来,又一层一层退去,退去的刹那在浅滩上留下些海藻、海贝和螃蟹。赶海的孩子赤着脚踩在浅滩上合着大海的节奏,趁着涌浪间歇的那阵去捡拾大海的馈赠,在他们小小的铅桶里装着贝、装着蟹,装着他们的欢笑。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海嘴的水,蓝得发黑,蓝得像钢,蓝得深不可测……这样的蓝色让我联想到浩瀚宇宙中的黑洞,它可以吞噬一切,但它却不可思议地泊起无数橈桅,泊起橈桅之间缭绕的蓝色晚炊。阴森可怖与宁静祥和竟是如此对立地和諧成一幅画。南海的海嘴当如苍穹之下的鹰之嘴吧?

见过北方的海嘴。或许是我所见有限的缘故,我觉得北方的海嘴,与北方的大地有着太大的差异。北方的海嘴是纤巧而美丽的,美丽得像灵秀的江南,而全然没有了北方大地的那种粗犷和苍凉。到棒槌岛,到峭山边上的海嘴去走走吧,见着的海蓝得像玻璃纸,发脆;蓝得

像欧罗巴人的眼珠,透着强烈的生的欲望和生命的气息。渔村往往傍着海嘴,傍着海嘴的渔村白墙红瓦,沿滩往往堆着无数牡蛎的壳,无数牡蛎的壳堆成小丘一般的形状,渔妇们傍着“小丘”编织渔网,而海浪唱歌一般在她们的脚旁哗哗而淌……北方的海嘴,当是北方大地的补色,当是鹦鹉一般重复着江南的故事吧?

当然也见过东海的海嘴。杏花雨的江南,其汇聚的水就是曲曲弯弯流进东海去的。但东海的海嘴,刚好与北方的海嘴相反,全然没有丝毫江南的丝竹韵致,反倒是一派北方山冈的秋季萧瑟,一派浑浊和苍茫。

何故?谁能说得清?谁又能说得清?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东海的海嘴们,分享了那条亚细亚第一大江从崇山峻岭带来的无数欲望和向往,它们就只能像山那般起伏出另一种曲线、另一种博大的颜色了。这种颜色与土地、与我们皮肤的颜色相似。东海的海嘴,诉说的或是北方的故事吧?



上海,是一座有记忆的城市,也是一座有活力的城市,上海的“城市记忆”应该鲜活起来。

2011年7月11日,在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人大网议日”上,一位名叫“苏涛”的网友对我说起了一件“憾事”。苏涛是一位年近八旬的退休中学老师,那年春天他从外地专程来看上海的名人故居,却找不到专门的“观光专线”。很多故居,他都是靠自己查资料、打电话摸索去的。因为不熟悉路况,一些景点的途中还走了冤枉路,旅行因此逊色不少。

这件事让我觉得特别遗憾。为此,我专门走访了相关部门并了解到,不少人来上海,不仅希望能体验一个摩登时尚的上海,也希望看到一个有记忆有故事的上海。没错,当年的十里洋场老上海,孙中山曾挥斥方遒主历史浮沉,张爱玲也曾倚窗听风看落叶飘零,鲁迅先生更在这里写就了《且介亭》。许多人都很想看一看这些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地

方,感受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历史魅力。但是,现实的寻找却令人很“茫然”——旅游线有多条,却没有名人故居专线;旅行社大多推荐外滩等标志性景点,对名人故居游等“小众线路”却不感兴趣;搭乘出租车时,大多司机也不知道具体地址。很多游客只好在网上按图索骥一个个寻找,或手拿地图找市民询问。

我听完这些情况后,感到不是我们的相关部门没做工作,而是在工作细化和量化上没有下功夫,造成这些线路的影响力不足。随后,我在书面意见中提出:建立一条串联名人故居的旅游专线,方便大量游客寻觅“芳踪”;同时,将上海1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文物市场编辑成小册子,发放到中小学,方便家长带着孩子们在双休日、寒暑假前往

创见往往通过特有的核心概念表达出来,而孔子的“仁”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独特思想创见的核心概念。“仁”的翻译,若选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英文词汇,不但会从一开始就降低了孔子思想的深度,而且也易使西方读者对“仁”的理解产生误差。将“仁”译为“Ren”,反而更有利于保存孔子思想的独创性和深刻性。坦率地说,既然西方读者今天能够充分懂得“功夫”、“风水”的奇妙,待以时日,他们一定也会理解孔子之“仁”的深意。

与“仁”的英译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孔子名字的英译。一位美国友人曾说起,孔子在英文中通常被译为“Confucius”(孔夫子),这个词其实多少带点调侃的味道。他认为,在向西方读者正式介绍孔子时,以用音译“Kongzi”为好。《新论语》的英译,也采纳了这一意见,正文中,多以“Kongzi”代替“Confucius”,以期有助于西方读者对孔子和《论语》能有新的认识。

他穿着一件长袍。

我还看到过奚啸伯,那是在当时延安中路连云路洪长兴饭店。洪长兴饭店的店员都是北京人,也是戏迷,有一位店员胡琴拉得非常好,是他到我的桌旁悄悄告诉我,那边桌上有一位就是奚啸伯。因为奚啸伯的戏我看得不多,便装样子我不认识,要不是他指点,我真会错过了。

我最高兴的是看到赵燕侠。她是我最爱看的演员,发音吐字很有特点,又清楚又好听。我太爱看她的《红娘》《大英杰烈》等戏了,甚至买了她的戏票请不看京戏的同事们去欣赏京戏。有一段期间她在

大舞台演出。大舞台斜对面有一条金华路,金华路有一家金华食府,主厨是湖北菜名厨。有一次戏散场后我跑到那里吃夜宵,竟看到赵燕侠穿着一件鲜艳的旗袍,在那里宴请戏班同事。我这时简直像看她的又一场戏,满足极了。

“文革”后我常去北京开文代会和政协会议,就有更多机会看到便装的京戏演员。不过这时除了张君秋、李万春等很少几位老演员,大都是年轻演员,如张学津、于魁智、刘长瑜他们。他们的戏我只在电视里看到。我还遇到了京戏理论家赵景彤先生,我爱看到他上前向他问好,他呆住了。我经常在电视里听他讲京戏,我同样景仰他。



京戏迷的幸福

任溶溶

可以也上三楼洗澡,他们专门让马连良跟我在一个小房间里休息,我们就可以交谈了,他们还说,这样做他们方便得很。这办法实在好,可是我胆子小,脸皮薄,见了马先生会说不出话来,实在不敢去惊动他。这样的好机会便错过了。不过能看到便装的马连良,我已经心满意足。

有一次我在南京路新雅饭店吃饭,看到一位顾客刚吃完饭离座。我一看,马上对我熟识的广东服务员小龙同志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宝森啊!”小龙同志接着告诉我,杨宝森经常到新雅来吃饭,很节约的。当时杨宝森就在新雅后面二马路的大舞台演出。

对了,我是杨宝森的粉丝,碰到杨宝森来上海演出,我三天两头要看他的戏,下了班就到看大舞台节目单并买票。有一次我有幸看到著名琴师杨宝忠站在戏院门口等人。我印象中

学校一些老师结社读书,没什么大义,也没申报什么“课题”,甚至无组织无纪律:十天半月,有空了,用两三个小时在一起交流读书感悟,茶水自带。各学科老师都有,话题是教育教学,也读小说,看闲书。有人建议,教师自觉学习,好事呀,行政上表示一下,发点书券什么的。老师们说,谢谢,不用了,读书是自己的事,和吃饭一样。因为组织松散,活动时,会有三五学生坐在稍远处,听老师们说些什么;有家长闻知,悄悄来旁听,记下老师读了些什么书,回去也买;外校的老师听说,有来联系旁听的。更有趣的,有位女教师的先生说,别冷落了我,我也要参加。有位老师在读书社受到启发,在家里宣布,我们家每星期活动一次吧,同读一本书,星期六晚上交流。

真好。果然是人以群分。但凡娱乐之事,这些老师好像都不大在行,不会喝酒,不会打牌,甚至也不“刷屏”。也没人从事有偿家教。教师什么样,学生就有可能成什么样。老师热爱读书,学生跟真正的读书人在一起,就有可能成为阅读者和思想者。

不管现实怎样,人总会怀着些美好的愿望。比如,我总认为如今其实是读书的好时光。我到这个年龄,看到那么多涌过来的书,总是百感交集,觉得自己可怜!该读书的年代没读书;后来有机会读一些书了,沉重的工作压迫着,虽然抓住了一点时间,读得很不够;退休了,可以读些书了,视力却不行了,记忆力也在衰退。“文革”时期,正值青春年华,然而那时想读书就是罪过。我插队时,得知知青朋友有几本书,跑十几里路,到了那里,回说,已经借给另一个人啦。这还算是有着落的,还有下一回。有时辛辛苦苦摸索到那村子,门上挂一把锁,被雨淋透了,人不知哪儿去了,甚至门前草已有一尺高了,只能失望而归。说起这些旧事,学生会问:“那你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呢?”我说:“真聪明。亏你没问我为什么不带手机。”1970年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青少年不知道,也想象不出。如今书店或图书馆里的绝大部分书,按当年的标准,都是禁书,——当年只要能得到一本书,我们能战胜饥饿,能忍受苦役般的劳动。

人被强行压迫在愚昧中,而向往文明的愿望挣扎着往上浮。这个比方未必恰当。我认为自己孤陋寡闻,是随着自己的读书经历感受到的。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不但少,结构也不合理。我们那一代人受的教育不完整,靠着一点点求知欲而浮起,勉力为之,也不过是现在这个样子。

有位忘年交教授朋友说,他有生以来动念想结束生命只有两次,一次是政治运动迫害,他熬过来了;第二次是患老年黄斑变性,没法阅读了。夫人真辛苦,每天找文章读给他听,但他说:“那只是获得信息,不是阅读,更不是生命的享受。”

我总是对老师学生说,也对学生家长说,还是尽可能读些书吧,谁知道明天会怎样呢。面对种种诱惑,能抗拒一步就守住一步。年轻时多读些书,打点底子,年老时不至于空虚无聊。

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了,读不读书,是自己的事。有一年,到某地去谈教师的阅读问题,下午座谈前,问邻座的老师,今年读了些什么书,他很诚实回答我“学校没发”,遂感到无话可说,说了也白说。

齐白石 89 岁那年画了一幅《山水鹭鸶》图。图上有山有水,湖岸有树有桥,湖水里有一群正在捕鱼的鹭鸶。图的左上方题写道:“乱涂几丛树,远望似有理。鹭鸶人不识,老翁且自喜。”可见白石老人到了耄耋之年仍有自喜的心态,难得。



自喜

陈迅

方题写道:“乱涂几丛树,远望似有理。鹭鸶人不识,老翁且自喜。”可见白石老人到了耄耋之年仍有自喜的心态,难得。

探访,通过调动公众积极、持久地参与,提高大家对上海人环境保护的关注度。这些建议都被相关部门一一采纳。

时隔三年,又是“人大网议日”,就“再谈文物保护”这一议题,我和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和网友的实时交流中,我认为

现存的文物是一部物化了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载体,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和珍贵历史资源。我们又该如何尊重传统、尊重历史、尊重文物?

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经济开发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部分文物收藏单位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责任不落实。尤其是管理部门一些有决定权的人缺乏对文物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导致大量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缺乏保养维护的尴尬局面。目前文物资源

开放利用程度不高,部分革命史迹、工业遗产和名人故居等建筑长期闲置或用于居住、办公,未能充分发挥文物的宣传、教育的功能。我以为,文物保护最大的障碍是文物保护执法力度的不足和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解决这些问题,同样要强化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目前,《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已由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的实施对上海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提高文物资源利用水平、推动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我出生在上海,我爱这座有记忆的城市,让这座城市的爱鲜活起来,大家要努力,我连任市十三届、十四届人大代表,更应尽一名人大代表的责任。

一位农民工代表在履职的7年里,是怎样反映农民工利益诉求的? 明请看本栏。

能多读点书,真好

王栋生



随想随说